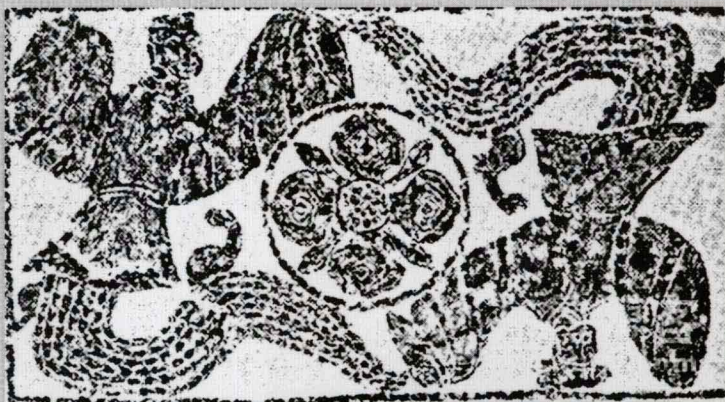


·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俗学研究书系 ·

朝戈金 主编

中日学者中国神话研究 论著目录总汇

贺学君 蔡大成 [日]樱井龙彦 | 编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俗学研究书系 ·

朝戈金 主编

中日学者中国神话研究 论著目录总汇

Studies on Chinese Myth, 1882-1998:
A Bibliographic Guide to Sino-Japanese Scholarship

贺学君 蔡大成 [日]樱井龙彦 | 编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日学者中国神话研究论著目录总汇 / 贺学君、蔡大成、
[日] 樱井龙彦编. —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2. 9
ISBN 978 - 7 - 5161 - 0751 - 5

I. ①中… II. ①贺…②蔡…③樱… III. ①神话—研究—
中国—专题目录 IV. ①Z88. B932. 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079665 号

出 版 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张 林
责任校对 王应来
责任印制 戴 宽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w.com.cn>
中文域名: 中国社科网 010 - 64070619
发 行 部 010 - 84083685
门 市 部 010 - 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 刷 北京君升印刷有限公司
装 订 廊坊市广阳区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12 年 9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2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 × 1000 1/16
印 张 50
插 页 2
字 数 845 千字
定 价 128.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电话: 010 - 64009791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俗学研究书系”编委会

主 编 朝戈金

编 委 卓新平 刘魁立 金 泽 吕 微 施爱东
巴莫曲布嫫 叶 涛 尹虎彬

总 序

自英国学者威廉·汤姆斯（W. J. Thoms）于 19 世纪中叶首创“民俗”（folk-lore）一词以来，国际民俗学形成了逾 160 年的学术传统。作为现代学科意义上的中国民俗学肇始于五四新文化运动，80 多年来的发展几起几落，其中数度元气大伤。从 20 世纪 80 年代开始，这一学科方得以逐步恢复。近年来，随着国际社会和中国政府对非物质文化遗产（其学理依据正是民俗和民俗学）保护工作的重视和倡导，民俗学研究及其学术共同体在民族文化和国家文化发展战略中，都正在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中国社会科学院曾经是中国民俗学开拓者顾颉刚、容肇祖等人长期工作的机构，近年来又出现了一批较为活跃和有影响力的学者，他们大都处于学术黄金年龄，成果迭出，质量颇高，只是受学科分工和各研究所学术方向的制约，他们的研究成果没有能形成规模效应。为了部分改变这种局面，经跨所民俗学者多次充分讨论，大家都迫切希望以“中国民俗学前沿研究”为主题，申请“院长学术基金”的资助，以系列出版物的方式，集中展示以我院学者为主的民俗学研究队伍的晚近学术成果。

这样一组著作，计划命名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民俗学研究书系”。

从内容方面说，这套书意在优先支持我院民俗学者就民俗学发展的重要问题进行深入讨论的成果，也特别鼓励田野研究报告、译著、论文集及珍贵资料辑刊等。经过大致摸底，我们计划近期先推出下面几类著作：优秀的专著和田野研究成果；具有前瞻性、创新性、代表性的民俗学译著；以及通过以书代刊的形式，每年择选优秀的论文结集出版，拟定名为《中国民俗学》（*Journal of China Folkloristics*）。

那么,为什么要专门整合这样一套书呢?从学科建设和发展的角度考虑,我们觉得,民俗学研究力量一直相对分散,未能充分形成集约效应,未能与平行学科保持有效而良好的互动,学界优秀的研究成果,也较少被本学科之外的学术领域所关注、进而引用和借鉴。其次,我国民俗学至今还没有一种学刊是国家级的或准国家级的核心刊物。全国社会科学刊物几乎都没有固定开设民俗学专栏或专题。与其他人文和社会科学的国家级学刊繁荣的情形相比较,学科刊物的缺失,极大地制约了民俗学研究成果的发表,限定了民俗学成果的宣传、推广和影响力的发挥,严重阻碍了民俗学学术梯队的顺利建设。再者,如何与国际民俗学研究领域接轨,进而实现学术的本土化和研究范式的更新和转换,也是目前困扰学界的一大难题。因此,通过项目的组织运作,将欧美百年来民俗学研究学术史、经典著述、理论和方法乃至教学理念和典型教案引入我国,乃是引领国内相关学科发展方向的前瞻之举,必将产生深远影响。最后,近些年来,国内外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大力推进,也频频推动国家文化政策的制定和实施中的适时调整,这就需要民俗学提供相应的学理依据和实践检验,并随时就我国民俗文化资源应用方面的诸多弊端,给出批评和建议。

从工作思路的角度考虑,“中国社会科学院民俗学研究书系”着眼于国际、国内民俗学界的最新理论成果的整合、介绍、分析、评议和田野检验,集中推精品、推优品,有效地集合学术梯队,突破研究所和学科片的藩篱,强化学科发展的主导意识。

我们期待着为期三年的第一期目标实现后,再行设计二期规划,以利我院的民俗学研究实力和学科影响保持良好的增长势头,确保我院的民俗学传统在代际学者之间不断传承和光大。本套书系的撰稿人,将主要来自民族文学研究所、文学研究所、世界宗教研究所和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的民俗学者们。

在此,我代表该书系的编辑委员会,感谢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史哲学部和院科研局对这个项目的支持,感谢“院长学术基金”的资助。

朝戈金

前 言



从世界范围来看，神话被作为科学研究的对象，或者说现代神话学的诞生，其源头可以追溯到 17、18 世纪，甚至更早。许多学界先驱为此作出了有益的贡献。维柯（1668—1744）的《新科学》（1725）可以作为神话学发轫时期的代表性著作。维柯探讨人类文化发展史，以神话问题为发端，为核心，提出人类发展的三个时代：神话时代、英雄时代和人的时代，并提出了“神话思维”说。此后 19 世纪初期，格林兄弟将语言研究中的历史比较研究法运用于神话研究，创立了影响巨大的神话学派。这些理论有力地推动了欧洲的“神话复兴”，到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神话学达到了鼎盛时期，学派林立，众说纷呈，思想活跃，生机盎然，其中很自然地也涉及中国的神话问题。此期（那时），西方神话学作为一种势头正健的强势文化，开始对古老的东方文化发生影响，即所谓“西学东渐”。

中国知识分子对于本民族神话的科学思考与探索，可以说是古已有之，只是一般都散见于各类典籍之中，未能形成自己的系统和相对完备的理论形态。20 世纪初，西方神话学理论开始传入中国。路线有两条：直接的来自西方，间接的来自日本。这种影响，使整个学界冲破对神话的传统观念，开始进行积极的学术反思，进而促成了现代神话学的诞生和发展。

从时间上看，最早接受新理论的，是 20 世纪初留学日本的一批青年学子。比较活跃的人物有梁启超、蒋观云、王国维、夏曾佑、周作人、周

树人（鲁迅）、章太炎等。1902年，梁启超在日本创办宣传新学的《新民丛报》。次年，蒋观云在该报发表《神话历史养成之人物》一文，率先在中国学界引入“神话”概念，虽为千字文却成为中国现代神话学的开源之作。接着，夏曾佑《中国历史教科书》（1905）、王国维《屈子文学之精神》（1906）、鲁迅《破恶声论》（1908）等著述，都借鉴神话学观点，并从不同角度论及中国神话，提出许多新鲜见解。在这些见解中，夏曾佑关于将中国古史之第一阶段称为“传疑时代”的提法，使整个思想界为之震动，启发了后来的“古史辨”学派，顾颉刚称之为“霹雳一声的革命爆发”。在此前后，周作人、沈德鸿（茅盾）等人又直接对西方神话学，特别是人类学派代表人物安德鲁·兰、泰勒、弗雷泽等人的理论、方法，作了翻译介绍。经过十余年的介绍和初步实践，神话学作为一门新兴学科在中国学界日益受到重视。

标志这一学科开始形成的，是20世纪20年代几位重镇人物的出现。

一位是鲁迅。他的《中国小说史略》（1923）和《中国小说的历史变迁》（1924）均有专门章节论述神话问题。他是把中国神话纳入中国文学系统，并对其本质、起源、发展、演变、分期、消歇原因，以及它与后世文学的关系等基本问题，作出系统探讨与阐释的第一人。由于具有深厚的国学修养，又吸收了人类学派的新观念，他的立论既富创见，且严谨扎实，显示着唯物主义的光芒。例如，关于神话产生于初民对天地间异常现象的“自造”的解释的观点；关于神话“不特为宗教之萌芽，美术所由起，且实为文章之渊源”的观点；关于小说出自神话，中外皆然的观点；关于中国古代神话分期（先秦、秦汉、六朝）及其演变（神话、鬼话、仙话）的观点；关于不了解神话就无法了解西方文学乃至西方文明的观点；等等。这些论述被后来治文学史者视为经典反复引证，由此确立了中国神话研究的重要一翼——文艺学的神话学。

一位是茅盾（玄珠）。他的理论和方法，更直接地来源于西方人类学和神话学。与鲁迅着重从中国文学自身系统探讨的路向不同，他把目光投向更为广阔的视野：力求通过中西神话的比较研究，将中国神话置于世界神话之林，揭示它们的共同性。代表性著作有《中国神话研究》（1928）、《中国神话研究ABC》（1929）、《神话杂论》（1929）等。这些论著显示出更强的现代性和理论色彩，使中国神话学在起步的时候便具备了相当坚实的基础。同时，作者也在比较中对中国神话的一些重要问题，阐述了自己

的观点。他率先指出，中国神话“过早消亡”的一个主要原因，是被历史化、哲学化改造的结果；中国远古神话在地域上应包括北方神话、中部区域神话和南方神话；并特别强调研究南方少数民族神话的重要性。他还在具体神话人物（如黄帝、蚩尤、夸父、帝俊等）研究上，发表了许多独到的见解。这些理论见解对当时和后来的研究都有重要的影响，推动了中国神话学人类学派的发展。

另一位是顾颉刚。他是一位著名的历史学家，精通文献古籍。二三十年代，他和杨宽等人以巨大的科学勇气和艰苦的学术探索，提出“古史是层累地造成的”的惊世之论，创立了著名的“古史辨”历史学派。在这一过程中，他们以崭新的历史观念和扎实的文献学功夫，沉潜到中国历史文化的底部，对上古神话资料和神话人物进行仔细的发掘、校勘、考辨、梳理、探究，力求从古史中还原神话，重构民族的神话体系。结论是：夏以前的古史都是神话，不是史实。这些成果包含在1924—1941年出版的七册《古史辨》中。顾颉刚本人有许多精彩的论述，其中特别引人注目的是对大禹形象的探讨。他以翔实的资料，细密地论述了大禹如何由古代典籍中开天辟地的神，逐渐演化为最早的人王，进而是耕稼的人王，最后，后生的人和纘绪的人才改成了他的同寅的过程，条分缕析，层层推进，完成了神话与历史的剥离。他和他的“古史辨”学派的历史功绩，在理论和方法上形成了历史学的神话学派和民族的神话史观，为中国神话研究的进一步民族化提供了示范和借鉴。

三位重镇人物以他们卓越的成就，为早期的中国神话学树立了三根坚实的柱石。在他们的周围，还有一批相当有影响的学者。这些学者虽然只是在各自专业研究（文学、文化史学、历史学、民俗学、宗教学、心理学等）过程中顺及于此，但由于学养别具，所论多有创见，如梁启超《太古及三代载记》、郑振铎《汤祷篇》、江绍原《中国古代旅行之研究》、林惠祥《神话论》、黄石《神话研究》、陈梦家《商代的神话与巫术》、黄芝岗《中国的水神》、钟敬文关于盘瓠神话及《山海经》研究系列论文、卫聚贤《中国神话考》、《三皇五帝的产生及纠纷》、郑德坤《〈山海经〉及其神话》、吴晗《〈山海经〉中的古代故事及其系统》等重要专著和论文。这些论著分别发表于20年代到30年代中期，使这一时期的神话研究从整体上更为丰富充实。其中《中国的水神》（1934）和《中国古代旅行之研究》（1935）两书尤其受人称道。前著以丰博的资料和比较方法，对水神神话

的发展演变进行了追根寻源的系统探讨，是中国神话分类研究的第一部专门论著。后著从一种非常特别的角度介入神话研究。他认为，人出门会遇见形形色色的鬼神精怪和有毒有害的生物，由此对古籍中大量有关的奇闻逸事进行分类研究，旁征博引，见解奇特，又不失严谨。

30年代后期，抗日战争爆发，许多大学和科研机构被迫迁到西南边疆。出乎意料的是，这个被迫的行为却促成了积极的学术成果。在缺少典籍资料的情况下，大批人文学者转而对西南地区少数民族神话展开空前规模的田野调查和综合研究。那些直接采自民众口头的大量鲜活的神话材料，不仅大大拓展了研究者的学术视野，也使他们的观念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从此，神话研究在更大的范围内，从单一依靠古籍文献走向文献与田野调查相结合，涌现出一批新的代表性成果。

影响最大的是闻一多的《伏羲考》（1942）。闻一多是一位学识渊博的学者，他不仅以文学创作和研究著称，在古汉语、古文字以及语言学、民俗学、民族学等方面也都有很深的造诣。在《伏羲考》中，他大量引用南方少数民族的民间文学资料，特别指出，研究神话不能只依靠那些最古老的版本，因为其中的神话形象描写过于简单，并且受到了撰写者的歪曲。经过重新考辨，他得出结论：“伏羲、女娲传说”并不如古书所记，二人先是兄弟，后来变为兄妹，再后才是夫妻；其原貌实际是叙述上古洪水遗民，兄妹成婚，繁衍人类的故事。同时他还对作为中华民族象征的龙、凤形象进行了寻根问底的探析，论证了龙为夏民族图腾、凤为殷民族图腾。他的著述，严谨细密，新见迭出，深受好评，至今仍具有重要学术价值。有关论文，在他逝世后被收入《闻一多全集·第一卷》（50年代曾以《神话与诗》单行再版）。此外，较有影响的还有芮逸夫《苗族的洪水故事与伏羲女娲的传说》、马长寿《苗族之起源神话》，以及吴泽霖、陈国钧、陶云逵、马学良等一批民族学家的神话论文。

在田野调查和综合研究方面起步较早的是民族学家凌纯声，30—40年代期间，他曾分别到浙江、湘西、云南、东北等地区对畲、苗、彝、赫哲等少数民族进行深入考察，写出一批内容新鲜翔实富有见地的调查报告和研究论文，如《湘西苗族调查报告》、《畬民图腾文化的研究》（1947）、《松花江下游的赫哲族》（1948）等，殊堪珍贵。这一时期，杨成志《云南傈僳族的巫师及其经典》（1931），孙作云《中国古代的灵石崇拜》（1937）、《中国古代神话研究》（专著，1942）、《后羿传说丛考》（1944），

常任侠《重庆沙坪坝出土之石棺画像研究》（1939），吕思勉《盘古考》（1941）、《女娲与共工》（1941），徐旭生《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专著，1943），杨堃《灶神考》（1944），吴泽霖《废些人之社会组织与宗教信仰》（1954），许道令《玄武之起源及其蜕变考》（1947），傅懋绩《丽江象形文〈古事记〉研究》（1948）等等，也都是很受关注的重要论作。

这里还要提到一位几乎被湮没的重要人物——程憬。据神话学史学者马昌仪介绍，在三四十年代，程憬曾专注于神话研究，先后发表《古代中国神话中的天、地及昆仑》等多篇有分量的论文，并以20年的努力于40年代末完成27万字的专著《中国古代神话研究》。全书包括“天地开辟及神统”、“神祇”、“英雄传说”、“海内外纪”四个部分，上下融贯自成一体，在方法和理论上均有建树，是继茅盾《中国神话研究ABC》之后“第二部 系统研究中国神话”的专著。（见《程憬及其中国神话研究》文，刊《中国文化研究》1994年秋季号）可惜作者不幸于1950年去世，此后由于种种原因该书迟迟未能问世。可喜的是，该书经顾颉刚整理，陈泳超编订，2011年1月由北京大学出版社正式出版。

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后期，近三十年的时间里，由于日益严重的“左”的教条主义和庸俗社会学的影响，特别是“文革”的破坏，中国大陆神话学领域，除袁珂《中国古代神话》（1950，后有增订版）、何满子《神话试论》（1957）、丁山《中国古代宗教与神话考》（1961）、徐旭生《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增订版，1960）等少数几部著作，和顾颉刚《息壤考》（1957）、胡念贻《关于后羿的传说》（1957）、胡小石《屈原与古神话》（1957）、李岳南《论后羿、嫦娥》（1957）、周庆基《黄帝传说与仰韶文化》（1959）、杨明照《四川治水神话中的夏禹》（1959）、孙作云《楚辞九歌之结构及其祀神时神巫之配置方式》（1961）、吴泽《女娲传说史实探源》（1962）、高亨《上古神话初论》（1962）、谭正璧《〈雪精〉的故事：一个古佚民间神话故事的探索》（1963）、袁珂《关于舜象斗争神话的演变》（1964）、《漫谈民间流传的古代神话》（1964）、胡厚宣《甲骨文商周鸟图腾的遗迹》（1964）等为数不多的一些较有分量的论文，以及内容相关的几部文学史外，几乎无甚可谈。而且，即使上述论著，也大多思维拘谨，在理论与方法上少有创新。这是一段令人遗憾的学术沉默期。

值得高兴的是，在这一段时期里，台湾及香港地区的神话学界相当活

跃,成果显著,正好弥补了大陆的不足。首先是老一辈学者,他们整理旧作,发表新论,形成一批重要论著,如卫聚贤《封神榜故事探源》(1960)、芮逸夫《中国民族及其文化论稿》(1972)、《尧舜禹出现于甲骨文考》(1988)、凌纯声《中国边疆民族与环太平洋文化》(1979)、苏雪林屈赋探索系列论著(20世纪70年代),以及管东贵《川南苗歌》(1980)等。20世纪60年代之后又涌现一批新人新作。1960年,杜而末的《〈山海经〉的神话系统》问世,该书观念新异,广受欢迎,多次再版;之后,这位才华横溢的博士又在创世神话研究、古帝系神话研究、虚拟动物神话研究、易经研究、古代宗教研究等方面推出多部新作。在有关著作中,他以月亮崇拜的模式对大量中国古代神话进行新的阐释。但印顺法师和王孝廉曾提出批评。他们指出,杜的许多结论套用外国理论而缺乏有力的本土材料依据。70年代,影响较大的是印顺法师的《中国古代民族神话与文化之研究》(1975)和王孝廉的《中国的神话与传说》(1977)。前著从上古神话中提出了羊、鸟、鱼、龙四大图腾信仰,进而由此区分出先民的四大部族联盟系统,并对龙、凤、麒麟、龟四种神兽作了详细分析,内容广博而丰富。后著是一部论文集,其中对神话发展与社会经济形态的关系、上古神话的分流、巨人神话以及神话与古代诗歌等方面的论述,均有独到之处。1987年,王孝廉又出版重要论著《中国的神话世界——各民族创世神话及信仰》,尝试对中华各民族神话作整体性历史性的研究。他的研究似更富民族特色。此外,文崇一、李亦园、李丰懋、朱传誉、杨希枚、张光直、谭达先、陈炳梁等也都是成果显著的人物。目前,他们有的依然活跃在台、港神话学界。值得注意的是,台湾神话学者还积极开展对台湾土著民族神话的田野调查与研究,李亦园《台湾土著民族的社会与文化》(1982)、浦忠成《台湾邹族的风土神话》(1993)、刘其伟《台湾原住民文化艺术》(1995)等著作显示了这一方面的实绩。

自70年代末、特别是80年代开始,随着“文化大革命”和极“左”的政治、思想路线的结束,整个中国大陆在“改革开放”中发生了巨大变化,相应地,神话研究也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据本书资料统计,自1978—1998的20年间,计出版专著784部,发表论文及有关文章6465篇,与1950—1977近30年的发表量(专著76部、论文及有关文章613篇)相比,增加9倍。这还只是量的变化,更令人欣慰的是研究之深度、广度的推进。

首先是神话基础理论研究得到加强。基础理论研究的强弱,不仅直接影响着应用研究的进退,也标志着一门学科的成熟程度。这一方面的研究在以前是相当薄弱的。80年代以来,大陆神话学者积极研讨,奋力建设。他们就神话的性质、定义、特征、起源、发展、演变,以及神话与历史、神话与宗教、神话与社会、神话与文学、神话与史诗、神话与传说、神话与习俗、神话与文化、神话学方法论等等诸多理论课题,广泛研究,热烈讨论,发表了大量论著。在研讨中,有的提出“广义神话”说;有的强调神话的非理性;有的突出神话起源的主体条件(心理机制、思想认识根源);有的着重从神话自身探其各种因素发展演进的轨迹;有的坚持传统理论的继承与革新;有的开辟更新的研究视角……新见不断,众说纷纭,百家争鸣。代表性的理论成果,有袁珂《中国神话通论》(主要是“概论之部”,1993)、武世珍《神话学论纲》(1993)、叶舒宪《中国神话哲学》(1992)、邓启耀《中国神话的思维结构》、郑志明《中国社会的神话思维》(1994)等。这些著作均从中国神话实际出发,前二者重在探讨神话学本体论,虽然见解不尽相同,但都提出了自己系统理论,尤其武世珍著,内容更为集中充实,结构更为完整严谨,实为我国第一部系统的神话学基础理论专著;后三者力求将神话学与哲学、文化学、语言学、思维科学等多学科贯通考察,通过对上古神话的重新解读与原型拟构,求索神话赖以生存的思维机制及其特征,并回答为什么“中国至今未脱原始思维”的问题。积极的理论建设有效地突破了传统的神话观念、理论框架乃至思维模式,从内部推动了神话学的发展和具体研究的深化。还要特别指出,经过讨论人们对中国神话内涵的认识,纠正了以前只讲汉族神话的偏颇,树立起包括56个民族在内的整个中华民族所创造、保存的全部神话(书面的和口传的)的整体观念。这一点,对于开阔研究视野,完整准确地认识中国神话,进一步提高研究水准,具有重要意义。

其次是神话本体研究的深入。这里首先要提出的是袁珂和萧兵的研究。袁珂是大陆一直坚持神话研究并取得丰硕成果的老一辈学者。他的贡献,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在深入研究的基础上,以历史为线索,以材料为依据,精心“连缀”与“熔铸”,将古神话系统化,《中国古代神话》(增订版,1960)、《中国神话传说》(1984)、《中国神话史》(1988)是其代表。这些著作集学术性、知识性、通俗性于一身,既体现着对中国上古神话“体系”的深层探讨,同时也促进了神话知识的广泛普

及。二是对《山海经》的独到研究。1980年，他的《山海经校注》问世。该书以对1181年以来的16种版本及各家注释仔细比较鉴别为基础，第一次专从神话的角度对《山海经》全书给予系统解释。校勘精当，注释翔实，征引详博，探微释疑，自成一家。三是《中国神话传说词典》（1985）、《中国神话大词典》（1988）的编辑和出版。前者可以说是完成了一个巨大的基础工程。后者则倾注了作者20余年心血、以辞书面貌出现的大型著作，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他毕生从事神话研究的集大成之作。从条目设置、体例架构、分类编排，到文字撰写，都直接体现着他的学术思想。这些思想主要包括：“神话的本质，始终在于文学”；“广义神话”论；“古籍记载”和“民族传闻”并重：中华多民族整体神话观——他认为，“少数民族神话，是和汉民族神话同步的……研究中国神话，少数民族神话这座宝库是值得我们花大力气去开发的。”（该书“代前言”）他的建树，有如一棵根深叶茂的大树，使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中国神话学坛，显得更加生机勃勃。

与袁珂相比，萧兵显然是后起之秀，70年代末才步入学坛。但他一起步就紧紧抓住神话不放，心无旁骛，真积力久，又选择了一个底蕴丰厚的学术对象——“楚辞”神话，加之自觉的方法论意识，主动地向其他学科吸取相关的理论滋养，这一切，使他在同辈人中具有了自己的优势。他认为，人类文化是一个广袤而又绵密的大系统，各子系统及系统诸元素之间既相独立又相制约，不可分割，研究任何具体文化现象，必须具有这样的意识。因此，他以“楚辞”神话为基点，一方面沿纵向向民族文化的根部，乃至山川气候、地理土壤，文化因子，进行深挖细探，力图破译其所以会如此的原始“密码”；一方面沿横向通过与中华上古不同集群文化，以及世界其他相关民族神话的比较研究，意欲在更为广阔的背景中进一步阐释其特殊的文化蕴涵。他的著述，广泛引用上古甲骨文、金文资料，以及日本、朝鲜、印度、伊朗、埃及、希腊、北欧的神话资料，分析独到，见解新颖。你或许会有不同识见，但不能不承认它的扎实，厚重。正因为如此，他的《楚辞与神话》（1987）、《楚辞新探》（1988）、《中国文化的精英——太阳英雄神话比较研究》（1989）、《楚辞文化破译》（1991）等论著及一些重要论文发表后，很快受到国内外学界的关注。他的成果，从一个方面代表了这一时期中国神话研究的新水平。

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神话本体研究，就总体而言，一个突出之点是

对上古神话探讨的不断深化。还在 70 年代末，老一辈学者顾颉刚发表《昆仑·蓬莱两个神话系统的流传与融合》（《中华文史论丛》第十期）一文，以丰富的资料，独到的见解，高屋建瓴地论述了中国古代神话由昆仑系统东传形成蓬莱系统，到战国中期，两大系统又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结合成为一个新的神话世界，并在后来的流传中，其故事和人物，逐渐转化为人的世界中的历史事件和人物的历史发展进程。这是他积数十年之思考所得出的结论。80 年代初，历史学家冯天瑜《上古神话纵横谈》（1983）问世。该书虽为普及性读物，却于中西比较之中，贯穿着作者对中国古代神话起源及其发展规律的独到阐释。此后，研究日趋精细，视角与方法越来越多样化。《诸神的起源》（何新，1987）由神话与历史之联系切入主题；《原始信仰与中国古神》（王小盾，1989）选择原始信仰作为观察视角；《空寂的神殿》（谢选骏，1989）试图借神话探讨“中国文化之源”；《英雄与太阳》（叶舒宪，1991）欲由“英雄与太阳”神话的研究重构“中国上古史诗原型”；《中国上古神话通论》（刘城淮，1991）意在揭示上古神话演化的历史轨迹；《神祇与英雄》（陈建宪，1994）关注的是“古代神话的母题”；《中原上古神话流变论考》（张振犁，1991）尝试利用民间神话资料对中原上古神话的流变进行新的探析；《盘古之神》（马卉欣，1993）以大规模、长时间田野调查为基础，提供了大量生动新鲜的文字和音像资料；杨义《中国历朝小说与文化》（1993）以现代意识和“亦析亦悟”的方法，谋求辨析上古神话的精神原型、思维模式和衍变脉络，并逐步形成自己的理论体系；《女娲神话与信仰》（杨利慧，1997）则进一步将女娲神话研究与相关民俗信仰考察相结合，促成这一领域的新拓展……这些都是有一定影响（也包括某种批评与商榷）的专题论著。

与论著交相辉映的，是众多富有见地的论文。这些论文涉及创世神话、人类起源神话、洪水神话、天体神话、土石山川水火神话、动植物神话、天国冥界神话、古帝神话、尧舜神话、商周及先秦祖先神话、文化神话、数字神话、上古典籍中的神话、原始宗教与神话、民间信仰与神话、考古研究与神话，等等，可以说上古神话各个领域无所不包。在这些论文作者中，叶舒宪是值得注意的一位。他既努力学习西学，又坚持从中学出发，所谓以“世界眼光”，做“中国学问”，所论多有新意，如《日出扶桑——中国上古英雄史诗发掘报告》（1988）、《从“盘古之谜”到中国原始创世神话之谜》（1989）、《人日谜：中国上古创世神话发掘》（1989）、

《帝王与太阳：“夔一足”与“玄鸟生商”神话今释》（1989）、《性与火：一个文学原型的跨文化研究札记》（1989）、《混沌、玄同、馄饨——中国上古复乐园神话的发掘》（1992）、《中国上古地母神话发掘——兼论华夏“神”概念的发生》（1997），等等。其新锐之气，仅从题目即可见出。此外，潜明兹《神话与原始宗教源于一个统一体》（1981）、程蔷《鲧禹治水神话的产生和演变》（1982）、杨堃《女娲考——论中国古代的女性崇拜与图腾》（1986）、吕微《中国洪水神话结构分析》（1986）、《“昆仑”语义分析》（1987）、金开诚《系统方法与〈九歌〉分析》（1987）、徐华龙《太阳神话的民俗学价值》（1987）、刘晔原《禹神话传说在中华文化系统中的位置》（1987）、蔡大成《东方之道——扶桑神话整体解读》（1988）、钟敬文《洪水后兄妹再殖人类神话》（1990）、宋兆麟《洪水神话与葫芦崇拜》（1990）、张铭远《洪水神话新论——兄妹婚与生殖信仰》（1990）、陈建宪《宇宙卵与太极图：论盘古神话的中国“根”》（1991）、李耀宗《天心一柱定中华——论黄帝出生、建都有熊的历史人文契机》（1992）、王钟陵《上古神话传说所反映的两性斗争》（1993）、许钰《黄帝传说的两种形态及其功能》（1993）、庞朴《黄帝考源》（1993）、巫瑞书《炎帝神农传说圈试探》（1993）、涂殷康《蛙神话源流》（1993）、吕洪年《防风神话的文化遗存》（1994）、龚维英《中国的〈金枝〉故事：由民俗神话学训释“逢蒙杀羿”》（1995）、李衡阳《三皇五帝传说及其在中国史前史中的定位》（1997）等，也都是有代表性的论文。透过这些论文以及前述论著，大体可以看出20年来中国大陆学界在上古神话研究方面，探讨方向和思维方式的深化、拓展与变革。

20世纪八九十年代神话本体研究的另一特点，是少数民族神话研究备受重视。这与前面提到的全民族整体神话观的树立密切相关。在这一观念指导下，少数民族神话成为全民族共同关注的文化财宝。对于这些神话的研究，既有本民族范围的探源，不同民族间的比较，又有全民族的整合，也有共同理论的探讨，内容相当丰富。从本书收集的资料看，中国大陆55个少数民族有50个民族都有神话受到关注，比较集中的是西南和东北地区的民族神话，特别是盘瓠神话和萨满神话。“盘瓠”被视为“西南民族起源的神话”，计有专题论文60余篇，分别对该神话的始作者、源流、演变、特征、价值、文化遗存，盘瓠氏的起源、分布、迁徙及其与苗、瑶、畲族的渊缘，以及盘瓠神话与盘古神话的关系等问题，进行了仔

细的探讨。在这个基础上，1994年，农学冠的专著《盘瓠神话新探》出版，从而使这一研究有了一个比较扎实的成果。萨满教是中国北方民族的宗教，涉及满、蒙、哈萨克、维吾尔、鄂伦春、锡伯、赫哲、达斡尔、鄂温克、裕固等众多民族。萨满神话与萨满教紧密相关，萨满神话的研究也是如此。这一研究成果更为丰富，发表论文二百四十余篇，出版专著九部，其中乌丙安《神秘的萨满世界——中国原始文化根基》（1990）、富育光《萨满教与神话》（1990）、石伟光等《苗族萨满跳神研究》（1993）、宋和平《满族萨满神歌译注》（1993）、富育光等《萨满教女神》（1995）等，都是有分量的著作。这些论著从不同视角、不同层面对萨满神话给予全方位探求，显示着研究的深度和广度。不少民族的神话研究均有论著出版，如《傣族诗歌发展初探》（王松，1983）、《论白族神话与密教》（赵櫓，1983）、《苗族神话研究》（过竹，1988）、《纳西东巴文化》（和志武，1989）、《藏族神灵论》（丹珠昂奔，1990）、《彝族母石崇拜及其神话》（钟仕民，1992）、《景颇族创世史诗》（勒包齐娃，1992）等，有的民族如彝族、白族、纳西族等甚至有多部面世。许多神话研究者在对少数民族作品进行民族文化溯源的同时，都很注意将其置于中华民族文化大系统中进行考察，于纵横比较中探讨不同民族文化之间互相影响共同发展的关系。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所（现为民族文学研究所）主编的《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史丛书》（目前已出40种），每一种一个民族，其中都有关于该民族神话的专门篇章。这套丛书的立意即在于从中华民族文学整体的角度观察和论述各个具体民族的文学。90年代，个人对少数民族神话综合研究的论著开始出现，如孟慧英《活态神话》（1990）、李子贤《探寻一个尚未崩溃的神话王国》（1991）即是受到好评的专著。为了推动少数民族文学研究的深入，相关的理论探讨也受到重视，陶立璠的《民族民间文学基础理论》（1985）是这一探讨的成果。至此，少数民族神话研究不再只是作为汉族神话研究的参照与补充，而开始具有了独立的学术地位。

与研究相关的是田野作业的广泛开展和民间“活资料”的大量搜集。据有关统计，至90年代初，已新征集神话60余万篇，逾十亿字。其中比较集中影响较大的，有防风神话、中原神话、纳西族祭天古歌等。这些新资料，不仅确证了中华民族神话的丰富性、连续性，也为一些重要问题（如洪水神话、上古神话源流等）的进一步探讨提供了有力的资源。正如钟敬文教授所指出的：“今天我们手头拥有这么多古典神话的口头遗存，